※ 書刊評介 ※

《秦簡牘研究》評介

顏世鉉*

《秦簡牘研究》由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陳偉教授主編，於二〇一七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全部共分為五卷，每卷一冊，分別為陳偉著《秦簡牘校讀及所見制度考察》、徐世虹等著《秦律研究》、晏昌貴著《秦簡牘地理研究》、孫占宇和魯家亮著《放馬灘秦簡及嶽麓秦簡《夢書》研究》、伊強著《秦簡虛詞及句式考察》。作者根據新出土的秦簡文獻為基礎，分別從制度、律令、地理、數術和語法這些方面展開討論。這些新出土的秦簡牘文獻，從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所出土的簡冊開始，一直到二〇一三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所出土秦二世詔書，一共發現十三批，其中有文字的簡牘超過二萬三千枚。這些秦簡牘文獻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對於深入認識秦國和秦代歷史與文化，產生了非常大的推進作用。《秦簡牘研究》很能夠真切地反映近年來學者根據秦簡牘文獻所做出的研究成果，而這些豐碩的成果也受到學術界高度的關注與重視。

本文主要對《秦簡牘研究》進行介紹與評論。囿於個人對秦簡牘文獻與相關研究的見聞不廣、認識不深，因此，下筆為文，在體例上不免會有輕重不等、簡繁不一的情況，而在評斷上也一定有不周全之處。以下是對這五本著作的評述。

一、陳偉《秦簡牘校讀及所見制度考察》

作者對於出土文獻的研究，非常重視文本復原的工作，所以在研究初始往往先進行釋文校讀與文本編聯的工作。由於作者在這方面具有深厚的素養，所以能夠成功地做好文本復原的工作。在成功復原文本的基礎上，再對所見制度進行深入的考

* 顏世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察，透過作者的研究，往往就把掩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古代制度具體而明白地揭示出來。

簡牘中表示詞語的用字往往會涉及到年代的問題，作者廣泛蒐集大量秦簡牘行政文書，據以考訂秦代避諱「正」字行用的年代、「奴婢」和「臯」字開始使用的年代。有關秦代避諱「正」字行用年代的問題，作者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二十七年兩年及秦二世時用「端」字來取代「正」字，其他時間（秦王政及秦始皇時代）依然使用「正」字。此問題歷來都呈現著晦暗不明的情況，經由作者的考論，能夠起撥雲見日之功，得到正確清晰的認識。有關「奴婢」一詞開始使用的年代，作者指出，私家奴隸早期用「臣妾」、「奴妾」之稱，始用年代當在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一年十月或者三十二年六月之間。有關「臯」字的使用年代，作者指出，捨棄「臯」字而改用「罪」字的年代，在秦始皇三十年五月至三十四年六月之間。這些結論都合理可信，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這類定年的研究工作，對於簡牘年代的判定很有幫助。

第十一章，討論「質日」的文本復原及其內涵，也考察「質日」主人與嶽麓秦簡的年代。第一，對質日簡加以重新編聯，使曆日自洽，復原了曆表的原貌，如〈廿七年質日〉簡 6/0564 和簡 7/0616 之間，應當再補足一枚簡；〈卅五年質日〉簡 27/殘 1-11「辛卯、庚寅」應當上提一欄位。第二，對於質日所載的地名，做出合理可信的考定。第三，嶽麓秦簡中有名為「爽」者，質日主人應即「爽」之父（頁 226），此人卒於始皇三十五年，由此可以推定嶽麓秦簡的年代不晚於這一年。

作者往往會對簡文進行重新釋讀和校訂的工作，以力求文意合理通暢，此類校釋的成果在全書中隨處可見，以下略舉數例：

（一）第三五八頁第五行〈秦二世元年二月甲午詔書〉「盡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毋以繇（徭）賦擾黔首」三句，其中「故」、「令」、「繇」三字原分別作「流」、「今」、「縣」；「今宗廟使（事）」，讀「使」為「事」。

（二）第三〇六頁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十八「徵門數實數 = 并黔首家」，「數 =」當讀為「數囊」。第三〇七頁乙種簡二四原釋文作「奪門主死」，「奪」字校改作「獲」。第三〇九頁乙種簡二四八原釋文作「是謂北龍」，「北」當改釋為「非」，讀作「飛」。

第十四章第一節討論「葉書」的稱名及其文本性質。睡虎地秦簡〈大事記〉（或稱〈編年記〉），李零據印臺漢簡把「葉書」讀為「牒書」。作者考察大量秦漢

簡牘，概括此類文獻形制體式分為三種：一是松柏漢簡《葉書》代表僅記帝王年世的形式；二是嶽麓秦簡 0418 簡四枚代表的是個人大事記的樣式；三是睡虎地秦簡《葉書》則二者並存。這類文獻的原整理者所用的稱名很不一致，作者則對它們做出定名，主張應讀為「世書」。這種讀法很能與文書的性質相契合，較為合理可信。

作者所採取的這種「文本整理」和「制度考察」並重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成果斐然，也很受到肯定，此誠堪為研究新出土文獻典範。

二、徐世虹等《秦律研究》

秦漢法律史是中國古代法律史之重要發展階段，在睡虎地出土秦代法律文獻之前，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只能藉由對漢律的輯佚與研究來探索、復原秦漢法律的原本面目。等到睡虎地秦律及張家山漢律出土，以往湮沒不聞的秦漢法律內容得以面世，而且日趨豐富。由於這些新出土文獻的研究日漸蓬勃，學者研究的範疇也大幅地展開，所得到的成果非常豐碩。本書收錄近年來學者研究秦漢法律的最新成果，所討論的內容包括：研究文獻的綜述，法律的形式、編纂、用語以及刑罰制度和相關制度等。這些研究對於揭示秦漢法律律令體系的構成、解析秦漢法律的存在狀態，開展出一個很好的局面。

本書包含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鄔文玲、陶安〈秦律簡牘文獻的出土與研究〉，揭示秦律出土簡牘概況和整理研究的成果，同時就相關釋讀意見加以討論並提出看法。南玉泉〈秦令的性質及其與律的關係〉、〈秦漢式的類別與性質〉，研究秦令、秦式，並揭示其在律令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徐世虹〈秦課芻議〉、〈秦漢法律的編纂〉，前者以里耶秦簡為基礎史料，探討秦課的性質及其法律地位；後者探討秦漢律的篇章結構、罪罰表述及規定與適用，據此認識中國古代法律的編纂及其演進。支強〈秦律用語與律義內涵〉，研究關注在秦律中的概念、術語及律文內部的構造用語，以透視秦律內在的關聯性，認識當時的立法技術。陶安〈秦律刑罰等序研究序說〉，主要在根據秦律資料所見的內在邏輯，復原秦律刑罰的等序體系。李力〈秦漢簡〈關市律〉〈金布律〉辨析〉，首先進行釋文校釋的工作，進而探討相關制度的涵義。鄔文玲〈里耶秦簡研究三題〉，討論戶賦問題、「續食」簡牘及其文書構成、「守」「主」稱謂與秦代官文書用語三個問題。

本書彙集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他們的研究方法，根據出土文獻來探討並建構秦漢法律的研究體系，由此得以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構造及其發展歷程有更客觀而清楚的認識。

三、晏昌貴《秦簡牘地理研究》

本書前六章內容所討論的「地理」，大都與行政運作與國家大事相關，屬於傳統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範疇。最突出的部分是第七章〈《日書》地理資料研究〉，利用戰國秦漢時期的「日書」材料，綜論古代中國在空間選擇方面的地理知識。這方面的研究頗具特色，一般研究地理，往往不涉及這類《漢書·藝文志》子部數術類的地理研究。

作者具有深厚的數術學涵養，所以在詮釋地理的相關問題時，往往能夠揭示其背後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這正可以反映出作者在秦簡牘地理研究方面的特色，以下舉兩個部分來看作者的研究特色：

第一章〈睡虎地秦簡「十二郡」及其相關問題〉，據作者的考察，秦國最早設立十二郡當在秦昭襄王晚期，而數字「十二」在古代被稱為「天大之數」，具有特別的含義，其來源應出於歲星（木星）的運轉週期。秦昭襄王晚年設置十二郡，並將之寫入睡虎地秦簡〈置吏律〉中，反映出它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它預示著秦朝因應天命、取代周朝一統天下的新時代的來臨。

第六章〈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新探〉，作者利用紅外線影像發現在木板地圖上有「北方」，並據此確定放馬灘地圖的方位為上南下北，此與目前已知的戰國中山國兆域圖和馬王堆漢代帛地圖的方位一致，由此可以推斷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國古地圖繪製的通行作法。這一點對於探索中國地圖繪製的源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作者再進一步分析解讀木板地圖的功能及其背後所蘊涵的意識，揭示其性質為墓主生前所實際使用的地圖；而各地圖所反映的地域大小，或係墓主人生前不同時期所職掌的地域範圍的變化。墓主把這些地圖隨葬於地下，也許正表明墓主希求死後能保有生前所擁有的權力。由此可見，解讀這一份地圖，須具有地理學和數術學的涵養，方足以達到如此周延而深入的解讀與詮釋。

四、孫占宇、魯家亮《放馬灘秦簡及嶽麓秦簡《夢書》研究》

本書考察兩批秦簡牘及居延漢簡數術殘簡文獻，分別為：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藏秦簡《夢書》、居延漢簡數術殘簡。全書分為四章，第一、二、三章研究放馬灘秦簡及居延漢簡數術殘簡，由孫占宇執筆；第四章研究嶽麓書院藏秦簡《夢書》，由魯家亮執筆。

第一章是〈放馬灘秦簡文本研究〉。作者著有〈放馬灘秦簡日書整理與研究〉，並參與《秦簡牘合集》第四輯《放馬灘秦墓簡牘》的撰寫。作者通過標識符號、斷簡綴合、簡冊編聯這三方面工作來離析分合選擇類目的篇章，如〈召日及日夜〉、〈衣〉、〈歸行〉、〈反支〉、〈土功（二）〉、〈門戶〉、〈候歲〉、〈占黃鐘〉、〈陰陽鐘〉、〈星分度〉……等，藉此復原數術文獻合理可信的文本，其成果完整地呈現於《秦簡牘合集》第四輯中。對簡文通假字的釋讀也多有發明。總體而言，對文本整理做出重要的貢獻，便於學者研究。

第二章〈放馬灘秦簡專篇研究〉專論三個主題，分別為〈十二支占盜〉與十二生肖源流、〈星分度〉的距度系統及相關問題、〈丹〉的文本屬性。作者根據放馬灘秦簡〈十二支占盜〉、〈黃鐘〉、睡虎地秦簡〈盜者〉、孔家坡漢簡〈盜日〉等文獻，論證十二生肖源於十二禽，而十二禽與陰陽五行干支結合，可用為占卜工具。在東漢行用干支紀年的背景下，形成十二生肖紀年。作者的論證詳實，信而有徵，自郭沫若以來關於「西來說」的各種論述得以息矣。

對於〈星分度〉，作者根據紅外線圖版來校釋補正簡文，重新加以綴合編聯，使之成為較為完整可信的文本。以此與睡虎地秦簡〈除〉、汝陰侯漢墓「六壬式盤」、北大漢簡〈雨書〉、九店楚簡〈十二月宿位〉、《呂氏春秋·十二紀》首章、《淮南子·天文》、北大漢簡〈堪輿〉這些文獻來對照，以古、今星度詳推上述文獻之日躔，相互比較，藉此推定〈星分度〉係屬《洪範五行傳》為代表的古星度系統。星分度的主要功用有二：其一，是曆法家用以推衍曆法；其二，是曆占家用以占斷吉凶。

對於〈丹〉篇，作者調整了文本的結構。將簡六剔除，歸入乙種日書〈陰陽鐘〉之中。簡八在先前出版的《天水放馬灘秦簡》一書已被剔除，把它編為乙種

日書二七六號；作者則據其內容，改歸入乙種日書〈貞在黃鐘〉之中。〈丹〉原稱〈墓主記〉，或視之為志怪小說類的文學作品，作者則以為其旨趣在藉主人公丹之口講述鬼的種種好惡以及祭祀鬼神應注意的事項，以宣揚鬼神信仰和傳播祭祀禮儀。其性質與睡虎地秦簡〈詁〉相似，所以當屬數術家作品。

第三章〈放馬灘秦簡與秦漢數術研究〉討論了楚、秦建除術及秦簡日書置建法、禹步及反支、太歲及剛柔日，並對若干居延數術殘簡進行考察。

第一節分析秦建除與楚建除的不同，指出孔家坡日書、漢簡所見建除十二神值日為秦除，此術沿用至今。今日香港、臺灣、日本和新加坡等地所用通書之建除術亦屬秦除，可證作者之論證可信。作者指出建除術所標示的月名為星命月而非朔望月（頁 153-154），這是正確的。又睡虎地〈日夕〉、孔家坡〈刑德〉所標示的月名，也是星命月而非朔望月。對於這方面，現在研究數術的學者往往有所忽略，作者正確地揭示了這種月名的屬性，對於相關研究極富意義。對於與建除術有關的禁忌，作者也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考察，得到正確合理的結論（頁 155-158）。

第二節討論「禹步反支」的問題。禹步為道教常見的法術，源於先秦。作者考察各種出土文獻說明禹步的功用，詳實可信。有關「反支」問題的討論，在推算方法和禁忌方面的說明，非常清楚詳盡。

第四節對居延漢簡數術殘簡考察。首先，是對釋文的校訂，大多正確可信。其次，以日書數術的原理來對殘簡的性質和分類加以辨析，論述詳實，做出重要揭示。

第四章討論嶽麓秦簡《夢書》。作者首先進行編聯、分類、文字考釋等文本復原的工作，並將原題名「占夢書」改稱為「夢書」。其次，考察西漢以前占夢文獻的流傳，討論《夢書》所見占夢文化，藉此揭示《漢書·藝文志》所說「眾占非一，而夢為大」的現象，反映出漢代人對於「占夢」在眾雜占中地位的認識。

五、伊強《秦簡虛詞及句式考察》

本書主要對秦簡文獻虛詞和句式進行考察分析，對虛詞部分的描寫和分析比較詳盡，而對句式這部分則較為簡略。虛詞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包括副詞、介詞、連詞、助詞、歎詞，狹義的則只有介詞、連詞、助詞、歎詞四種。傳統對於虛詞的認定是採取廣義的範圍，甚至還包含了若干代詞。作者對於虛詞的認定

則採取狹義的定義。

作者對虛詞的考察分析很細微，同時與傳世文獻對照比較，由此能夠明白地揭示秦簡牘文獻的語法特色。這類語法現象的發掘，對於探索古漢語語法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下舉出三例：

(一) 作者在第十八至十九頁指出，以介詞「于／於」和「以」來引介時間的功用，「于／於」的用例，在傳世文獻中，遠遠多於「以」，而在秦簡中卻未見此種用例。作者認為，這種語法現象是因為介賓結構在句中多用作狀語，而「于／於」式的介賓結構多作補語。此與語序有關，這是因為介賓結構移到謂語之前，這種現象應該在秦簡牘的時代已經逐漸形成。

(二) 作者說：「在傳世秦漢古籍中，『至』的出現次數比『到』多得多，相反的是在秦簡中『到』的出現的次數則明顯比『至』多。」(頁 114) 作者的考察很細微，而結論也可信，這種現象表現秦簡牘語言有口語化的傾向。

(三) 作者第一一四頁也指出，在秦簡牘非日書類文獻中，「可」和「可以」的用法與傳世文獻比較一致；而在日書類文獻中，「可以」已經詞彙化為雙音節助動詞。

作者的研究也有若干疏忽或可商榷之處，以下舉出三例：

(一) 作者在書中沒有列出「歎詞」這類來考察。秦簡牘文獻中歎詞的句例並不鮮見，如周家臺秦簡〈已齶方〉「皋！敢告東陳垣君子」(簡 326) 和「噓！垣止，苟令某齶已」(簡 330)，睡虎地秦簡《日書》甲〈夢〉「皋！敢告爾矜竒」(簡 13 背)。

(二) 對於有的句法的分析不夠精確。例如在第三五七頁，對於 [NP1]+ 卑(俾) / 使 / 令 + [NP2]+VP 這種句式，作者說：「[] 表示成分的可有可無。」這種說法不夠周延，應當是「[]」這個成分可以省略。又如在第三四〇至三四四頁將「是 =」解讀為「是是」，第二個「是」理解為判斷句的繫詞。作者文中引用魏宜輝、楊錫全的看法，他們認為「是 =」所表示的就是「是謂」這個語詞，這個觀點頗受到重視，也已經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作者沒採取這個看法，卻也沒有進一步提出有力的論證，論斷略嫌草率。

(三) 對於有的詞語的理解不夠精確。例如在第一七六頁，作者論及「句、筍(苟)」用作假設連詞，在前一分句裏表示條件。其中所引「(2) 筍(苟) 令某齶已，請獻驪牛子母。周家臺 326-327」這條用例並不恰當，這是出於作者對「筍

(苟)」字詞義有所誤解。此「筭(苟)」並不是作為假設連詞來表示「如果」這個意義，而是作為勸令副詞來表示「祝願」、「希望」的意思。「苟」常見用於假設連詞，但也有用作勸令副詞，在句中作為狀語，表示「祝願」、「希望」的意思，例如：

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和。」是猶
奔其目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皆視。」豈不謬哉？（《墨子·耕柱》）

古書中相關的用法可以參考清代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苟」字條以及現代何樂士《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年）第一四九頁。在周家臺秦簡〈已齟方〉中也有相同的用例，如：

已齟方：見車，禹步三步，曰：「輔車車輔，某病齒齟，筭(苟)能令某齟
已，令若毋見風雨。」即取車輦，毋令人見之，及毋與人言。操歸，匿屋
中，令毋見，見復發。

此「筭(苟)」在句中明顯表示「祝願」、「希望」的意義，而非表示「如果」意義的假設連詞。

總體而言，作者對於秦簡牘虛詞的考察細緻精審，對於秦簡牘文獻中比較特殊的語法現象也多有發掘，可以說對語法發展史的探索，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雖也有若干小缺失，但也是瑕不掩瑜。

附記：在本文撰寫的過程中，得到許名瑯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